

農技援助之外： 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

劉曉鵬*

摘 要

本文試圖以種族的角度思考 1960 年代的臺非關係。筆者認為透過臺灣版的「殖民論述」，臺北將非洲國家在聯合國的政治支持予以合理化，其結構是「落後的」非洲黑人承認臺北的國際領袖地位，乃基於仰慕臺灣優越的中華文化。因此，雖然臺北在國際上逐漸難以代表中國，在非洲卻仍然能擁有當大國與正統中國的滿足感。

關鍵字：非洲、種族歧視、黑人、援助、先鋒案、楊西崑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11 月 14 日。

- 一、前言
- 二、臺非關係的起點
- 三、感化非洲
- 四、光榮下的忍耐
- 五、反抗美國
- 六、結論

一、前言

國際關係中，發展援助原本是一國幫助他國發展，但因主要以國家預算為之，故難與政治考慮脫勾。也因此過去半個世紀無論是西方或兩岸，絕大多數有關研究1960年代臺非關係的學者都是以「先鋒案」為中心，強調援助——特別是農技援助——換取政治，繼而以聯合國投票結果為標準，計算非洲國家在中國代表權問題對中華民國的支持，證明該政策的成功。¹ 至於其整體評價，前臺灣駐馬拉威大使陳錫燦所言可下一結論：「農耕隊最大的貢獻，就是阻礙中共延遲十年進入聯合國，這在援外歷史上是不可磨滅的。」²

¹ 許多中美關係的著作都提及這段歷史，惟就專著而言請參考：David Nelson Rowe, *Free Afro-Asi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New York: American Afro-Asian Educational Exchange, 1963); David Nelson Rowe, *The New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frican Countries* (New Haven: National Council of Scholars, 1969)。臺灣首位有系統撰寫臺非關係，應是中央研究院學者魏良才的英文作品：Liang-Tsai Wei, *Peking versus Taipei in Africa, 1960-1978*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1982)。中文作品最完整的應是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上海學者張紹鐸與胡禮忠則以統計方式比較兩岸在非洲的支持度，參考張紹鐸、胡禮忠，〈「臺灣當局」對非洲農技「外交」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60-1971年）〉，《西亞非洲》3（2009年9月），頁32-37。

² 原文出自前臺北駐馬拉威技術團團長作品。參考施民男，〈非洲生活憶往〉，《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電子報》44（2003年9月29日），下載日期：2011年6月15日，網址：http://www.icdf.org.tw/epaper_file/20030929134921v2epaper-no44.html#3。

但是援助所產生的副作用也日益受到學術界重視，除了援助的效益普遍受到質疑外，由於施與受的關係會產生階級，而援助關係從決策到執行又多發生於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故也有種族角度的批評，認為援助強化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優越感。³ 相對於國際政治加強種族意識，另一種研究是以國內種族意識影響外交政策，強調國家內部對族羣的主觀態度影響到國際問題處理。如美國在1950-1960年代國內處理黑白種族問題的作為，即影響到其如何看待非洲反殖民主義的浪潮。⁴

本文試圖透過種族⁵的角度思考1960年代的臺非關係。當時的臺灣政府雖然有效統治僅侷於一小島，政治心理上則是大中國。一般而言，中國因無殖民非洲的紀錄，因此有關歧視黑人的研究較少。但天朝上國的歷史與漢胡關係相輔相成，有限的論述中也證實對黑人存在著歧視。如果這個角度看，雖然現有的著作中強調臺灣在非洲的援助行為交換非洲的政治支持，但臺北在階級上如何看待接受援助的非洲人，而非洲的回應又如何強化臺北觀點，就值得開啟另一層研究。

筆者將以中華民國外交部公報、回憶錄、及部分官方檔案為基礎，加上《新聞天地》、《大華晚報》、《臺灣日報》等平面媒體記者在非洲的長期採訪報導，強調當非洲提供臺灣維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簡稱「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所需票數，臺灣也在非洲建立了臺灣版「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認定自己所代表的中國足以領導「落後的」非洲，合理化所獲得的政治支持。簡言之，即當先進的臺灣遇到「落後的」非洲，黑人在仰慕下接受其中華文化的優越性，繼而承認其領袖地位，提供政治支持。據此臺北在國際上受挫的同時，在非洲卻持續擁有擔任大國與正統中國的快感。

由於時代變遷，參與農耕外交的中華民國籍人士，今天雖稱「臺灣人」，當年由於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自認為代表中國，對自稱或被非洲人稱為「中國人」，

³ 參考：Paulette Goudge, *The Whiteness of Power: Racism in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nd Ai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03).

⁴ 有關美國國內種族歧視與外交政策的問題，請參考：George White, *Holding the Line: Race, Rac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1953-196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Michael L. Krenn ed., *The Impact of Race on U.S.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9).

⁵ 本文採用牛津字典「種族歧視」的定義：一種認為一個種族裡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某一種特定的品質或者能力，並以此區分人群及種族間優劣的信仰或者觀念。

不但絲毫不以為意，甚至十分自豪。為了重現原貌，也為襯脫出政治意涵，本文一方面在敘事時用「臺灣人」來代表來自臺灣的人，另一方面在引用原文回顧「臺灣人」在非洲的表現時，請注意「中國人」經常代表當年臺灣官定意識形態。

二、臺非關係的起點

(一) 惡種

與黑白種族問題的研究相較，學術上有關中國對非洲人歧視的研究較為少見。1980年代以前，由於北京政府的反資反帝路線，多數著作將中國人視為非洲的解放者，只有少數研究曾提及黑人在中國社會遭遇的種族壓力。⁶ 1980年代由於改革開放，中國社會抗議活動日增，其中一些針對黑人的暴力與示威吸引了媒體報導，並促成一些學術研究。⁷

Frank Dikotter 的作品中對黑人在近代中國的地位有清楚的描述。近代中國由於受到達爾文物競天擇說的影響，許多傑出的學者都採用白人的看法，認為黑人落後、愚笨、懶惰、兇暴、髒臭，⁸ 居人類各種族最低階。特別是康有為在《大同書》中甚至提出解決黑人的辦法，他認為白人的地位最高，而期待透過婚（交）配等方式漂白有色人種。不過黑人的性情、腥臭與相貌恐怕都無藥可救，則應將其絕種，使「區區黑人之惡種者，誠不必使亂我美種而致退化」。⁹

黑人地位可能也不是近代才開始低。光滑的白皮膚在中華文化中不僅用來決定女子美醜，也用來評斷男性。比方說「白面書生」的意義中除了容貌與學問，還暗示較高的社會地位與較優閒的生活，而相對而言，深色皮膚則暗示勞力、日

⁶ 例如：Emmanuel John Hevi, *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6); Alan Hutchi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6).

⁷ 參考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Barry Sautman, "Anti-Black Racism in Post-Mao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June 1994), pp. 413-437; Michael J. Sullivan, "The 1988-89 Nanjing Anti-African Protests: Racial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Ra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June 1994), pp. 438-457. 這些研究都強調膚色問題，且中方也常以黑人或黑鬼稱呼非洲人。本研究為維持原意，多處亦將以「黑人」為非洲人的代稱。

⁸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 38-39, 82, 89, 149.

⁹ 康有為著、鄭柏林選注，《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137-144。

曬與骯髒的工作環境，進一步代表較低的經濟文化地位。相對於「白」的正面意義，與「黑」相關的字眼也很容易給予負面印象，如「黑話」、「黑心」、「黑市」、「黑道」等。¹⁰

1949年之後的臺灣雖然與中國大陸走不同的政治方向，但對黑人固定的印象仍然存在。M. Dujon Johnson 是非裔美國人，在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取得博士。因常穿梭兩岸有感於雙方對黑人的特定立場，2007年曾撰寫兩岸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書中除了說明黑人與白人待遇的差異，還詳述個人民間生活經歷，並以商品廣告佐證。他將兩岸歧視黑人的文化證據追溯至古代，也指出古代由於黑人被視為生食類蠻夷，較白人蠻夷地位還低。¹¹

M. Dujon Johnson 作品中對臺灣的描述主要是針對一般平民。但當今駐外人員可能還是繼承了許多對黑人的特定印象。「晚上黑人很多，我怕……」是臺北駐加拿大副代表周莉音首次外派美國時的恐懼，¹²「老黑頭腦簡單」是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農技人員對甘比亞當地人的印象。¹³該基金會最早的前身是「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理論上是協助非洲發展的單位，而非洲也是臺灣在1960年代重要的外交支持。如果當今外交官與援外人員都會不經意以文字表現出對黑人的特定印象，半個世紀前剛與非洲交往時，臺灣對黑人的種族意識又是如何？

（二）先鋒案

1960年由於大批非洲新興國家進入聯合國，加上其反殖反帝意識形態，對來自美國的壓力有反抗心理，連帶使臺灣在聯合國的地位開始受到挑戰。由於中國代表權案向來被美國以「緩議案」壓制，新進的非洲國家對此表示不耐，故1960年該案幾乎得不到非洲國家的支持。該年美國緩議案雖以42：34獲勝，但棄權國高達22國，是十年來最差的成績，中華民國政府遭遇遷臺以來最大的國際挑戰。

¹⁰ Barry Sautman, "Anti-Black Racism in Post-Mao China," p. 427.

¹¹ M. Dujon Johnson, *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 Chines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s and African-Americans*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7), pp. 14-15.

¹² 周莉音，〈中美餘暉 告別駐美最後大使〉，《聯合報》，2007年7月18日，第A19版。

¹³ 宋勝祥，〈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駐甘比亞技術團工作經驗談〉，收於高小玲、邱裕瑄，〈駐塞內加爾、甘比亞技術團業務暨督評估暨塞內加爾中小企業技術協助計畫期中評估，民國91年2月24至3月12日〉（臺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2002），頁7。

剛上台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政府頗思以二個中國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手段，但在考量國內及冷戰局勢後，1961年美臺一方面在法律手段上祭出「重要問題」的程序手段持續壓制北京入會，¹⁴ 另一方面為了聯合國的支持票數，拉攏非洲國家也成為臺灣的政策選擇，援助因此成為政策工具。然而臺灣並不具備援助非洲國家的經濟實力，為了冷戰大局著想，美國秘密提供援助非洲的財源，臺灣因此得以前往非洲提供農業援助，這就是著名的「先鋒案」。

先鋒案雖是華府與臺北的合作，但臺灣主要是提供人力，金錢方面的投入遠低於美方。臺北的貢獻一直維持在每年25萬美金左右，而美國的支持在1961-1962年約為40萬美金，1963年後調為200萬美金左右，1967年批准1,875萬美金給臺灣使用三年，1971年初批准一筆1,000萬美金援助後即宣布中止支持，臺灣亦於三年後結束該案。¹⁵

回顧1960年代的政策環境，當時自認為代表中國的臺灣，透過援助而得到非洲國家支持其中國代表權。先鋒案的目的雖然是聯合國的票數，但理論基礎則參考國父遺教中的「扶助弱小民族」。¹⁶ 大多數學者考慮到的是扶助、感激、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關係。但是對方弱小就意味著本身強大，既然援助會產生階級，「弱小」、「強大」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又是什麼關係？

（三）外交官的非洲印象

在開始這層援助關係之前，或許基於傳統對非洲的認知，也可能基於自身對非洲人的印象，中華民國政府許多官員對非洲「弱小民族」並沒有太多好感。先鋒案開始前新聞局長沈鈞就已先前往非洲，帶回來的印象是黑非洲人「享受、自

¹⁴ 「緩議案」即當中國代表權受到質疑，華府即動員盟國主張該屆大會不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重要問題」則是基於中國代表權的內容要求北京取代臺北，可能涉及聯合國憲章中會員國加入與除名的問題，故先定位該議題是否符合憲章十八條的「重要問題」。該辯論與表決通過之後，第二部分由北京盟國所發起的中國代表權案，就必須有三分之二多數始能通過。

¹⁵ 有關美國財源，請參考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65-185；劉曉鵬，〈從非洲維持美臺聯盟：重新檢視「先鋒案」〉，《臺灣史研究》14：2（2007年6月），頁162-178。

¹⁶ 「扶助弱小民族」是先鋒案的道德與理論基礎，臺北官方在不同場合皆強調依據此國父遺教而援助非洲。參考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182；《外交部週報》880（1968年3月5日），頁4；中華民國外交部藏，〈中非技術合作現況〉（1969年2月），「農技合作綜合性政策，五十年一月到五十八年十二月，第一冊」，《非洲司檔》，檔號：583／非24。部分外交部舊檔案，今已移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放。

大、倨傲、混亂、骯髒而沒有責任感」。¹⁷ 幾年後沈錡派駐非洲，印象仍類似：「非洲人究竟還留著原始的頭腦，一點文明人的思想行動都沒有學到。」¹⁸ 1960年駐喀麥隆公使廖仲琴也對其在當地外交工作不順歸因於該國總統「少學識」，且「不了解黑人心理」。¹⁹

1961年，先鋒案首先援助的二個對象是利比亞與賴比瑞亞。利比亞和漠南非洲政經文化皆有所不同，膚色差異外，也非「新興獨立國家」，但由於地理因素，又被包涵在先鋒案的援助概念下，故又常被拿來和黑非洲相提並論。駐利比亞大使陳質平對利人的評價是「善變多疑、自私無情」，並進一步評價非洲人是「重物質」又「缺乏國際政治認識」。²⁰ 駐賴比瑞亞大使湯武則指賴比瑞亞人「懶惰倔強」。²¹

即使著名的外交才子葉公超對非洲也沒有好感，他指「非洲獨立國家無不自大，故建交後一律派大使」。至於人才選派不必太嚴謹，因為在非洲正常外交業務不多，而「當地文化水準復低，我不宜以正常尺度自限」。²² 葉公超雖不經管非洲業務，但他的想法可能被實際應用，媒體很快發現駐非外館「名義上都稱大使館，那只是討好黑人，實際職員人數不過兩三位。」²³ 或許也基於交往「不宜正常尺度自限」的心態，1965年臺北懷疑駐馬達加斯加大使汪公紀有忠誠問題，竟在未知會對方政府的情形下，以武力綁架汪大使全家回臺。²⁴

¹⁷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第二冊，頁264-265。

¹⁸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三冊，頁298。

¹⁹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駐喀麥隆大使館民國電部〉（1960年10月15日），「中喀在聯大互助，四十九年五月至六十年一月」，《非洲司檔》，檔號：CM/19。

²⁰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陳質平致蔣總統私函〉（日期不清，但應是1968年底，因內容在談論廿三屆聯大事），「爭取非洲國家在廿三屆聯大助我代表權，57年12月至58年1月」，《非洲司檔》，檔號：AI/14。陳質平當時已由駐利比亞大使轉調為駐墨西哥大使。

²¹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湯武自蒙羅維亞電部〉（日期不清，但應是1961年6月間），「中賴技合政策報導，50年9月至51年11月」，《非洲司檔》，檔號未註。以下部分「檔號未註」者，乃為中華民國外交部檔資處僅允筆者手抄之檔案，該批檔案多處標示不明。

²²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葉公超自巴黎電部〉（1960年1月12日），「我爭取奈及利亞第一冊，四十八年六月至四十九年十月」，《非洲司檔》，檔號：211.1。正常檔號在211.1處會有更細緻的案次號，此檔並未標明。

²³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臺北：臺灣日報出版社，1969），頁57。

²⁴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五冊，頁47-48。特務誘騙汪公紀一家人上船後即出示槍支，並啟航押往臺灣，但汪大使被押返後不久又無罪釋放。馬國總統對該案顯得十分沮喪，一方面稱讚汪大使能幹，一方面也公開表示無能為力，該國駐臺大使則指汪公紀綁架案是對該國的侮辱。同被綁架者包括汪大使的女兒——輔退休的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汪琪。

臺非關係開始之初只有少數外交官得以接觸非洲，其批評主要是文化水準低落，觀其內容則包羅廣泛，大抵是貪、懶、笨、髒等等，幾乎是以「蠻夷」相稱。在關係一開始就把對方看低，如何獲得政治支持？陳質平大使明確提出了與非洲相處的方法：「我須以忍耐誠懇道義與之相處才能維持良好友誼」。²⁵ 忍耐力謂著給予對方援助的同時，也要忍受貪、懶、笨、髒的非洲人。誠懇道義則是中國文化概念，雖然行為要如何合乎誠懇道義很模糊，但用文化涵養來推動外交的主張則十分明確。既忍耐又要展現文化特質，是接下來臺非關係的主軸。若用更不修飾的說法來形容，就是感化非洲。

三、感化非洲

由於臺北必須時常證明自己仍是中國，故也需時常強調自己受到「弱小」「蠻夷」的尊敬，間接鞏固其對自身實力與文化的信心。對非外交上，官方與媒體證明自己仍是大國的主要方式，主要透過上千名在非洲各處建立農田的技術人員。他們的工作理論上是要以精耕模式去增加非洲糧食生產，使「非洲國家能達到經濟獨立」。²⁶ 這等於是中國農耕文化挑戰非洲的殖民經濟與地廣人稀的傳統。而既然被援助的對象已經被主觀認定文化落後，先進的臺灣所帶來的中國文化在非洲也必將在非洲帶動進步。

大多數的文獻都強調臺灣當年成功地在農業上協助非洲，惟就實務而言，當時許多幫助非洲的農業成效實際上無法持續，因其只有短期效果，故成功的說法是有爭議的。這部分已有學術討論，不再贅述。²⁷ 援助的核心意義既然也包涵中國農耕文化移植非洲，在這個過程中，臺灣除了有中華文化的優越感，也找到政治上代表中國正統的證據，這種自豪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²⁵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陳質平致蔣總統私函〉（日期不清，但應是1968年底，因內容在談論廿三屆聯大事），「爭取非洲國家在廿三屆聯大助我代表權，57年12月至58年1月」，《非洲司檔》，檔號：AI/14。

²⁶ 《外交部週報》1051（1971年6月15日），頁14。

²⁷ 中國大陸部分，請參考鄭文聚，〈從援助到合作開發：展望廿一世紀的中非農業合作〉，收於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編，《中國與非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302-310。臺灣部分，請參考 Philip Hsiaopong Liu, "Planting Rice on the Roof of the UN Building: Analysing Taiwan's 'Chinese' Techniques in Africa, 1961-pres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98 (June 2009), pp. 381-400.

（一）超英趕美

近代中國國際地位下滑使各政府亟思恢復固有地位。就國民黨政府而言，遷臺後雖坐在聯合國擁有安理會席位，實際上不但仰賴美國，被英法拒絕承認，也需承擔來自蘇聯與北京對其合法身分的一再挑戰。非洲給長期以來恢復故有地位的慾望找到一個宣洩口，也找到了大國的地位。在對非農技援助中充滿著其它大國不行，臺灣人一到就行的事蹟，也為王文隆形容為「技驚全球」。²⁸ 「全球」的意涵中如何技驚非洲已毋需多言，其餘的地區就是指技驚白人或歐洲殖民大國。

就和美國的比較而言，先鋒案最早提供農業援助的地點在賴比瑞亞的Gbedin，也常強調美國人在該處失敗，而臺灣人接手則迅速獲得成功。臺灣人長期承受美國的壓力也在非洲獲得發洩。農耕隊員中有放棄美國工作而來的，其理由就是「在美國人家把我們踩在腳下，在非洲我們被人家捧在頭上」。²⁹ 而就國際關係而言，一般人並不知道美國金援農耕隊的背景，援非工作乃獨立進行，故相信「中華民國今天的外交工作，倚賴美國之處甚多。但非洲外交之開拓，完全是我們自己奮鬥獲致的。美國想要策應，也是心餘力拙。」³⁰

反共抗俄時代，在非洲也能與另一個超強蘇聯一較高下。蘇聯在迦納指導的國營農場撤退後，臺灣的農耕隊住在他們留下的宿舍，隊員即稱「占領蘇聯」，而該農耕隊長的座車是蘇聯的伏爾加牌（Volga），迦納只有兩輛該款車，而另一輛由蘇聯大使乘坐，故被用來暗示該雙方地位對等。³¹ 在甘比亞的農耕隊也形容蘇聯如何佩服農技團：「俄國人偷偷來看，揉揉他自己的眼睛，摸著他那罪惡的大鼻子，這是事實，不是因從北極熊老窩來到烈日非洲，曬了頭而產生的幻覺。從此黑心的北極熊也折服了。」³²

由於歐洲勢力甫離開非洲，故要展現臺北的實力，常用的方法是與前歐洲殖民母國比較。有時會指出國名，有時就直接以膚色形容。例如波札那農民告訴農

²⁸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75。

²⁹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141。

³⁰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臺北：新聞天地出版社，1970），頁89。

³¹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214。

³² 《外交部週報》1055（1971年7月13日），頁14。

耕隊，英國人統治波札那多年，農業上一無所成，到他們來了之後才改善。³³ 農耕隊去利比亞也是因為英法等國專家無法解決其農業問題，³⁴ 後來利國進而大量任用臺灣軍方人士更是因為不相信義大利人。³⁵ 盧安達曾為比利時殖民地，人民在臺灣的農耕隊到達後，「把中國人估計的遠比白種人為高」，而在前法屬殖民地尼日的情形也類似，「崗警一看是中國人，就急忙拉起柵欄放行，並立正舉手致敬……當地人和白種人都要經過查問後才能放行的。」³⁶

到非洲的農耕隊超英趕美的絕招就是勤奮，這是技驚全球的基礎，據稱個個都下田的工作熱忱，令波札那英籍農業部長吃驚。³⁷ 盧安達國際合作暨計畫部長巴加拉加沙（Thadee Bagaragaza）也告訴楊西崑，臺灣經濟雖不如歐，但能與非洲人並肩合作，歐洲人「要求高度享受，此為其不受歡迎之主因」。³⁸ 換句話說，超英趕美的關鍵，在於農耕隊付出更多的勞力，這也是精耕文化的特色。

（二）文化領袖

吃苦耐勞是中國傳統農業精耕文化的產品，強調勞力付出換得較佳生產。雖然勞力密集的農耕文化移植到非洲不見得一定能造成可持續性的農業發展，但對臺灣有精神意義。因為當國際上越來越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時，臺北若產生幫助非洲經濟獨立的力量，又有技壓白人大國的成果，必定可以在非洲產生強大的政治與文化自信。

除了外交官以外，無論是媒體或是農耕隊所見的非洲，都普遍存在對黑人文化落後的批評，也帶有濃厚的種族歧視味道。有時嫌其髒，如「黑人體臭嚇跑觀光客」。³⁹ 黑人也常被指愚笨，「黑人腦筋單純」算客氣的說法。而最普遍的是認為黑人不懂數字的嚴重程度達到「如果有一個黑人能說出自己的歲數，那是奇聞。」這樣的說法多少有些誇張，惟不僅被當作「非洲民族天賦」，也有與其它

³³ 《外交部週報》984（1970年3月3日），頁9。

³⁴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73-74。

³⁵ 《外交部週報》984（1970年3月3日），頁9。

³⁶ 盧安達與尼日的報導，參考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22。

³⁷ 《外交部週報》984（1970年3月3日），頁9。

³⁸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楊西崑與盧安達國際合作暨計畫部長談話電部〉（1966年5月27日），「中盧農技合作協定，五十五年五月」，《非洲司檔》，檔號不明。

³⁹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138。

深膚色人種比較基礎，因為非洲人和臺灣「高山同胞有一樣缺陷」，⁴⁰ 或是「和東南亞國家的人民差不多」。⁴¹

所以，當楊西崑四處「糾正一般人對非洲的錯誤觀念」，澄清「非洲人的智慧並不低於我們」，⁴² 其實是在證實臺灣「一般人」覺得黑人笨。和吳鳳感化「高山同胞」同樣邏輯，要傳授農技給智慧低的非洲人只好改善其文化：「農耕隊接觸的就是智慧貧窮之人……傳授農技之前，要先做好一大套移風易俗的工作。」⁴³ 移風易俗的主要工作就是改善其懶惰習性。非洲人懶的報導比比皆是，據稱賴索托人還會將此個性傳染給臺灣人。⁴⁴

不過農耕隊到達後，因為與非洲農民一起下田，非洲人由於感動而由懶變勤的捷報更多。在尼日「自我農耕隊到達後，懶惰的風習業已逐漸改善……以前常聽人說非民族天性疏懶，不習勞動，是永遠無法改造的……但因我國農耕隊的技術指導和精神感召，而養成勤勞和生產的習慣。」⁴⁵ 駐塞內加爾的隊長孔慶仁眼中，臺灣一起赤腳流汗感動了當地人，不但喻為奇蹟，且有移風移俗的效果，因「中國人使男女一齊種稻，打破以往的非洲習慣。」⁴⁶

波札那副隊長張曾剛指出「非洲人懶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勤勞對他們的好處」。⁴⁷ 但勤勞的好處必須從市場獲得回饋，其它如政策、人口和資本投入都會影響人的工作意願。臺灣的援助講究勞力投入，豐收場景必然會有「臺灣來了批神仙」的視覺效果，⁴⁸ 但由於非洲農業大環境沒有變化，也引起英法德等專家對可持續性的質疑，而農耕隊的回答是：「非洲人的民族自信心，已透過我們的鼓勵恢復了，他們一定會好好幹。」⁴⁹

⁴⁰ 以上對非洲人智力的形容，請參考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 38、63；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 111。

⁴¹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二冊，頁 178。

⁴² 楊西崑不只一次做出這樣的澄清，參考《外交部週報》699（1964 年 9 月 14 日），頁 2；《外交部週報》705（1964 年 10 月 26 日），頁 1。

⁴³ 耿修業，《非洲見聞錄》（臺北：大華晚報社，1968），頁 102-104。

⁴⁴ 《外交部週報》1056（1971 年 7 月 20 日），頁 15。

⁴⁵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 132-139。

⁴⁶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農耕隊長孔慶仁報告〉（1968 年 6 月 15 日），「駐塞內加爾農耕隊政策第三冊，五十五年一月廿四日至五十七年八月五日」，《非洲司檔》，檔號不明。

⁴⁷ 《外交部週報》984（1970 年 3 月 3 日），頁 9。

⁴⁸ 徐萬椿，《非洲訪問記》（臺北：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1966），頁 22。

⁴⁹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 210。

移風易俗和提升民族自信是何等艱難的工作，但官方的想法肯定民間報導。楊西崑認為由於「農耕隊員在田間與非洲人並肩工作，恢復非洲對本身工作能力的信心，也恢復其對土地的信心」。⁵⁰ 楊西崑更舉象牙海岸總統為證，說對方生病仍急切見他，告訴他農耕隊「增加非洲人民自信心，證明非洲人並不懶惰」。⁵¹ 這樣的想法有白人國家支持，外交部引述比利時報紙，指農耕隊不僅教人民種稻，並使當地人民受到「中國文化與生活紀律之薰陶」；⁵² 也舉美國扶輪社的報導，指歐洲人說非洲人懶，但非洲人被臺灣農耕隊改變，駐利比亞農耕隊門口甚至放了一個「聖人」(These are the Saints)的牌子。⁵³

(三) 政治模範

臺灣在非洲既然被形容成是改變文化及賜予糧食的聖人，非洲報答的方法就是在政治上表達讚美。媒體、官方，甚至學界對非洲領袖滿意農耕隊表現的文章擷拾皆是，在此不多敘述，只舉一個甘比亞的例子：甘比亞總理為了感謝臺北幫他們的子孫永遠有飯吃，說若該國只能有一個國家建立邦交，那必然是中華民國。⁵⁴

非洲政治領袖不只讚頌中華民國，也傾慕中華文化，據說加彭總統彭哥(Omar Bongo)和象牙海岸總統伍弗布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都熱愛太極拳，⁵⁵ 而剛果(金夏沙)總統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更把其農莊建成中國式，連傢俱廚子都要從臺灣來。大使丁懋時說：「我們可以看出剛果總統對中國之友好態度以及對我文化藝術之嚮往。」⁵⁶

⁵⁰ 《外交部週報》902(1968年8月6日)，頁10。

⁵¹ 《外交部週報》728(1965年4月6日)，頁1。

⁵² 《外交部週報》847(1967年7月18日)，頁2。

⁵³ 《外交部週報》922(1968年12月24日)，頁6。原文出自William Clifford, "These Are the Saints," *The Rotarian* (Evanston) 113: 5 (November 1968), p. 26。這位美國作者可能籠統地把對漢南非洲黑人的偏見，套到北非阿拉伯人身上。

⁵⁴ 《外交部週報》1055(1971年7月13日)，頁14。

⁵⁵ 蔣碩平，《非洲十五年與旅途見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75；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224。

⁵⁶ 《外交部週報》884(1968年4月2日)，頁13。

非洲人對中華民國幾乎沒有什麼不崇拜。即使英文字幕有問題，馬拉威人看了臺灣電影還是會高興地流眼淚。⁵⁷ 剛果代表團遠道來臺灣看憲法，以做其制憲參考。⁵⁸ 楊西崑訪馬達加斯加還教導治國方針：「楊旋風離境了，但餘威猶存，報上登著楊的臨別贈言：建國要從人民的食衣住行育樂六大方向開始。這將是馬國人民永遠記憶的一句話，也是中華民國最珍貴的禮品。」⁵⁹ 楊西崑的旋風也吹到茅利塔尼亞，他帶著 100 萬美元的援助項目訪問茅利塔尼亞時深獲對方總統重視，用餐時把總統位子讓給他坐，急切見他的程度也超過會見美國助理國務卿威廉斯（Gerhard Mennen Williams）。⁶⁰

會崇拜中華民國的外交部次長，當然也就會崇拜領袖蔣介石。非洲海關與軍人看到臺灣訪客時，會公開大聲讚頌蔣總統偉大，也請訪客返臺時向蔣介石致意，「反映一般非洲人民對蔣總統的崇敬之情」。⁶¹ 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是一本連他的秘書沈劍虹都覺得過於嚴肅所以不可能暢銷的作品，⁶² 但非洲人似乎很有興趣。上伏塔總統拉米薩（Aboubakar Sangoulé Lamizana）花了二十多個晚上讀蔣總統的《蘇俄在中國》，週末更是研讀到凌晨三四點。⁶³ 獅子山國會圖書館需要好書來做國際研究，「《蘇俄在中國》真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一百本都不嫌多」，⁶⁴ 剛果（金夏沙）唯一的政府電台則每週逐章播放該書。⁶⁵ 楊西崑也證實非洲各國領袖都認為《蘇俄在中國》是一本值得重視的著作。⁶⁶

除了書之外，蔣的照片也很受歡迎。楊西崑就指出「總統在非洲朝野領袖心目中地位極高」，親簽玉照給馬達加斯加、加彭、象牙海岸總統等，「彼等皆引以為榮」。⁶⁷ 莫布杜證實楊西崑的話，他說蔣總統不僅為中國歷史性之偉人，也為世界歷史性之偉人，很早就從書本上與學校中認識了蔣總統，蔣「對非洲問題之

⁵⁷ 《外交部週報》1039（1971年3月23日），頁10。

⁵⁸ 《外交部週報》642（1963年8月8日），頁2。

⁵⁹ 《外交部週報》681（1964年5月11日），頁2。

⁶⁰ 《外交部週報》728（1965年4月6日），頁1。

⁶¹ 《外交部週報》591（1962年8月16日），頁2。

⁶² 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頁24。

⁶³ 《外交部週報》824（1967年2月7日），頁1。

⁶⁴ 《外交部週報》714（1964年12月29日），頁21。

⁶⁵ 《外交部週報》731（1965年4月27日），頁2。

⁶⁶ 《外交部週報》727（1965年3月30日），頁1。

⁶⁷ 《外交部週報》916（1968年11月12日），頁8。

遠見，更覺欽佩」。⁶⁸

不只蔣介石，他的夫人在非洲也深受愛戴。蔣夫人的英文演講以冷僻用字著名，但說法文的尼日總統每夜自習二小時英文，也以「內容文字均屬上乘」的夫人演講稿當研習範本。⁶⁹ 馬拉威總統班達（Hastings Kamuzu Banda）和莫布杜一樣年輕時就關注中國革命，特別欽佩蔣夫人於西安事變時，威武不屈地陪同蔣介石共處時艱，蔣夫人是如此愛國與偉大的女性，故班達與非洲人民都深深的敬佩。⁷⁰ 臺北官方也證實蔣夫人在非洲的確很有名，例如駐利比亞大使陳質平在1962年指出「北非國家的婦女，對蔣夫人十分敬佩」，⁷¹ 而一年後外交部長沈昌煥將地理範圍擴大，成為「非洲各國婦女對蔣夫人很崇敬」。⁷²

即使是外交辭令與強人政治下的口號，但非洲在臺灣的宣傳建構上迥異於國際上其它地區。隨著農技合作所帶來的交往，加上非洲相對落後的形象，與臺灣超越白人大國的報導，非洲人被臺北官方與媒體塑造成極為崇敬中華民國的族羣，來自臺灣的個人崇拜與政治文化，亦得以複製在他們身上。

（四）神氣的中國人

複製與崇拜的結果，中華農耕模式似乎成為解決非洲糧食問題的唯一處方，於是外交官員產生「要以稻米取代玉米及樹薯，成為非洲人的主食，改變非洲人的主食習慣」的雄心壯志，⁷³ 媒體也有「臺灣若能移去非洲一百萬人從事開墾……可解決大多數非洲國家缺糧問題。」的聲音。⁷⁴ 中華文化也成為解決非洲問題的萬靈丹，更有學者呼籲「歐美人士以他們行之於本國那一套法欲求協助推行於非洲必然扞格，我們在臺灣這廿多年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土地改革、工業建設這一套經驗，才是非洲各國易於接受的……大量青年像漢代的張騫班超一樣，前往非洲宣揚我文化並且幫助他們。」⁷⁵

⁶⁸ 《外交部週報》1044（1971年4月27日），頁4。

⁶⁹ 《外交部週報》1011（1970年9月8日），頁3。

⁷⁰ 《外交部週報》851（1967年8月15日），頁4。

⁷¹ 《外交部週報》605（1962年11月22日），頁2。

⁷² 《外交部週報》647（1963年9月12日），頁1。

⁷³ 《外交部週報》635（1963年6月20日），頁1。

⁷⁴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8。

⁷⁵ 任薇孫編，《非洲與中國》（臺中：自刊本，1970），頁49、82。

張騫與班超歷史上是漢胡關係的溝通者，且漢胡歷史被用在臺非關係十分常見，楊西崑就被讚美為「精神可以張騫、班超比美的外交家」。⁷⁶ 張騫與班超兩位歷史人物在當代雖因平等精神則改成外交家，惟這種讚美很少用在出使歐美的外交使節身上。漢胡角度下的「幫助」、文化批評、與移民思維，臺北在非洲「扶助弱小民族」時，透露的心態其實與殖民者相差不遠。

但中華領袖在行為上和殖民者最大的不同，就是願派人委身屈就一起下田，為改造黑人落後的文化而努力。透過這個動作，中華民國獲得尊敬與感激，也擁有政治效忠。從農耕文化到政治的關係可以引用媒體到非洲的發現：「中國人賜給我們糧食，和我們一起在田裏工作，我們要感激他們」、「中華民國在非洲人心目中是泱泱大國」、「農耕隊所表現的無私服務態度，在黑人心底引起了共鳴」、「非洲是中國人的世紀」，⁷⁷ 因此「不論局勢如何改變，已在非洲紮根的中華文化，只有日漸發揚，而永遠不會消失」。⁷⁸ 臺灣的領袖地位若引用來臺訪問的剛果（金夏沙）報社社長的形容，乃中華民國「已能與世界上的任何強國相比」。⁷⁹

官方不斷加強這種信念。沈昌煥部長指出對友邦技術援助增強我國國際地位，特別是在非洲。⁸⁰ 楊西崑說農耕隊是臺灣的「王牌」、⁸¹ 「非洲人民都很感激中華民國，他們希望中華民國繼續協助他們，接近他們」，⁸² 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主任錢劍秋指出「凡是沒有到過中華民國的（非洲）人，都想前來觀光，而曾經到過我國觀光的人更想再來訪問，非洲人民對我文化非常嚮往」。⁸³ 經濟部次長張研田形容他在非洲考察時，經過之處當地人民都夾道歡呼，「中國人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比在非洲更神氣了」。⁸⁴

⁷⁶ 《外交部週報》610（1962年12月27日），頁2。

⁷⁷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89、179、255-257。

⁷⁸ 耿修業，《非洲見聞錄》，頁110。

⁷⁹ 《外交部週報》797（1966年8月2日），頁2。

⁸⁰ 《外交部週報》660（1963年12月12日），頁1。

⁸¹ 《外交部週報》705（1964年10月26日），頁1。

⁸² 《外交部週報》727（1965年3月30日），頁1。

⁸³ 《外交部週報》853（1967年8月29日），頁3。

⁸⁴ 《外交部週報》1062（1971年8月31日），頁4。

除了夾道歡呼外，農耕隊在象牙海岸的花車表演更深刻地展示「神氣中國人」的建構：

該花車拖有一輛十五公尺之平台拖車，上面佈置田園豐收之景緻，車端有一宮殿式之八角涼亭，亭中則置有一豐盛的酒席，八位黑農用筷子在那裏大啃大嚼，拖車之週圍則佈滿了如瓜果、蔬菜，及稻穗之農產品。由於車上黑農不時布施著白飯糰，一路吸引了大批口饞的孩子們向車上不斷需索。⁸⁵

臺北當局在非洲建構的大國圖像非常清楚：非洲人想吃飯要靠我，至於誰是我，則是宮殿與八角亭所代表的中國。八個「用筷子」的成年人是臺灣的學徒，大嚼之餘還「布施」（扔？）出白飯糰，對比與孩子們的需索，代表臺北代表的中國在非洲成功「扶助弱小民族」，那麼獲得非洲友邦支持其政治與文化正統，也理所當然。

四、光榮下的忍耐

實際上即使有美國的金援，臺灣能在非洲使用的預算一年最多也只有幾百萬美金，實在難以在廣大的非洲與眾多友邦間產生有效「改變主食」與「扶助弱小民族」的力量。為了強化非洲支持臺灣所代表的中國正統，只能將資源用在最重要的地方。前述臺灣外交官對非洲人貪、懶、笨、髒的形容，其中懶、笨、髒，遇到農耕隊的中國文化都是可以解決的，達荷美農耕隊有以下故事：

達荷美隊收容了一位黑人孤兒，這小孩在三歲的時候父母雙亡，隊員們用中國方法將他養大，教他說中國話，教他禮貌，教他用筷子吃飯，這個七歲的孩童與一般非洲兒童比較，不知道要聰明多少倍，足見教育的重要。隊員們叫他小臺灣，大家都用愛心培養他，有位隊員說，我們正在培養一位總統。小臺灣的發育情況非常良好，身上也不會散出難聞的氣味，七歲

⁸⁵ 蔣碩平，《非洲十五年與旅途見聞》，頁78。

稚齡已懂得儲蓄，完全擺脫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非洲習慣。在這裏工作的黑人，男工一天 150 西非法郎，女工 70 法郎，小臺灣的工資是 50 法郎，他已儲蓄了七千法郎，約合臺幣一千元。這位天資聰穎的小黑炭，替農耕隊員提水壺，替大家跑腿。夕限西下，非洲麻雀成群結隊地飛來吃稻時，小臺灣又會敲著銅鑼，在阡陌間飛跑，替大家趕鳥。他勤快，他聰明，長大了能夠接受良好教育，真是前途無量。⁸⁶

7 歲童工為農耕隊打雜被形容為提升非洲人文化的高尚行為。學習中國語言、禮貌與使用筷子，可使文化低落的非洲人變得聰明、勤快、「身上也不會散出難聞的氣味」。這個幼童與臺灣人接近時接受中國文化薰陶，同時解決了懶、笨、髒的問題，不但幫助非洲弱小，也是「小黑炭」／「小臺灣」將來變成總統的重要訓練。觀諸許多官方與民間論述，這也是非洲熱愛臺灣的重要因素，因為臺灣的中國文化幫助了非洲。

然而，文化論述下則暗示如何滿足貪欲可能才是臺非關係的基礎。這個故事的另一部分則顯示，以 1960 年代的背景而言，非洲由於地廣人稀，農村人工費不見得比臺灣低，一天臺幣 20 元的工資，約相當於當時臺灣基層公務員的薪水，即使 7 歲童工一天也有臺幣 7 元的收入。這表示臺灣的農耕隊到非洲農村，都會帶來就業機會和一筆可觀的收入，男女一起下田與夾道歡呼的榮景，不見得只是受到中華文化精神感召，應也有金錢感召。

金錢也解釋為何那麼多臺灣農耕隊到非洲領袖家鄉去「示範」。往好處想是：「每個國家都有總統農場，乃至副總統農場，某某部長農場。雖說這些農場是屬於總統或部長私人的，但是這種以身作則提倡農業，發展農業，對國家的農業建設依然有好的影響。」⁸⁷ 但實際上大官不可能自耕自食，所以提供家鄉支持者就業機會的可能性比較大。農耕隊成為執政者的政治資源，不但照顧自己人，偶爾還要用來安撫不同派系。甘比亞農耕隊就報告「Basse 地區為反對黨大本營，對政府一向持反對立場，但我農耕隊在該地區推廣水稻成功，使該地區反對黨人士

⁸⁶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 219-220。

⁸⁷ 耿修業，《非洲見聞錄》，頁 110。

轉而支持甘比亞政府。」⁸⁸ 在臺灣人手緊缺時，賴比瑞亞仍要求臺北增派人力，因擔心內部分配不均，引起某郡認為有偏袒之嫌。⁸⁹

官員農場除了回饋鄉里，其農業生產收益也可以提供大官生活補貼。前述兩位熱愛太極拳與蔣介石照片的非洲領袖都擁有總統農場，其中象牙海岸總統據稱即使人到巴黎也會打電話回農莊詢問水稻生長情形。往正面思考是總統關心農業，但另一可能的原因是農耕隊使該農莊一個月收益達1萬1千美金。⁹⁰ 加彭總統以政變上台，防心很重，但農耕隊員「有特別通行證得隨時進出戒備森嚴的總統府」。⁹¹ 他們所持的蕃茄、甜椒、萵苣雖是臺灣農業技術的證明，惟也有可能是總統籠絡官僚體系的手段。藉由臺灣在援助的名義下，替政府官員種菜，因而「減輕了各級政府官員家庭預算裏最龐大的蔬菜支出」，⁹² 且該國事實上「無人口壓力，不愁糧食，農民大量湧入都市，故對農業推廣不予重視」。⁹³

剛果的莫布杜對臺灣的農耕隊管理其農莊讚譽有加，說了許多感佩蔣總統將其農場從沙漠變為田園的話，⁹⁴ 但「農業示範」收成在變賣後屬其私有，農耕隊也變得像私人展覽品，「每當有外國元首和貴賓訪問剛果而被款待於賓館中，他們便可以看中國農耕隊工作」。⁹⁵ 若再配合臺灣幫莫布杜另外準備的中國式別墅、傢俱、廚師、與侍者，這幅中國農村景像，絕不只大使丁懋時說的「對中國文化藝術之嚮往」那麼單純。

臺北不可能不明白許多非洲領袖以農技合作之名行貪腐之實。剛果農耕隊長徐容章公開向媒體怨道：「十年學農，志在為國利民。現在雖然捨己之田，耕人

⁸⁸ 外交部非洲司、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臺北：外交部，1976），頁256。臺灣派赴各政要農場一覽表，請參考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159-163。

⁸⁹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非洲司長與賴比瑞亞農業部副部長會議紀錄〉（1970年6月4日），「中賴技合政策報告，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十二月」，《非洲司檔》，檔號：231.32/0002。注意談話時間與檔案編輯時間並不符合。

⁹⁰ 蔣碩平，《非洲十五年與旅途見聞》，頁75。

⁹¹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中非技術合作現況〉（1969年2月），「農技合作綜合性政策，五十年一月到五十八年十二月，第一冊」，《非洲司檔》，檔號：583/非24。

⁹² 商岳衡，《非洲新面貌》，頁224。

⁹³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駐加彭使館電部〉（1970年12月2日），「第廿五屆大代表權案，五八年八月至五九年十二月，第三冊」，《非洲司檔》，檔號：A4/0001。

⁹⁴ 《外交部週報》851（1967年8月15日），頁4。

⁹⁵ 《外交部週報》895（1968年6月18日），頁7。

之田，如果對非洲農民能有所助益，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現在為私人作嫁，想起來真不是滋味。」⁹⁶ 雖然不是滋味，但由於其外交目的，便得考驗陳質平大使所謂「忍耐」非洲人的功夫了，臺灣最需要的是政治支持，故駐非農技人員必須「收起滿腔悲苦，換上一幅笑容，和異族稱兄道弟，握手言歡，這是為了什麼？自然他們彼此心裏是雪亮的」。⁹⁷

農技之外，拉攏非洲關係時實物饋贈仍不可少。金錢是比較常見的方法，有時也用贈送機票遊臺灣的方式，待非洲訪客來臺後，再提供「愉快與豐富的旅程」(everything will be done to make your trip to Taiwan a joyous and fruitful one)來達到討好的效果。旅程內容可參攷拉攏肯亞外長 James Nyamweya 的經驗，臺灣與肯亞無邦交，但仍安排這位外長訪臺並招待嫖妓。⁹⁸

因此，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主任錢劍秋所指「非洲人民對我文化非常嚮往，沒到過中華民國的人都想來觀光，來過的人還想再來訪問」，可以有其它角度的解釋。不過性招待地點需經篩選才會給客人留下好印象，因為有些地點不願忍受非洲人。圓山飯店是由「非洲婦女非常崇敬」的蔣夫人所掌，也是當時最具中華文化風情的飯店，該飯店對黑人的態度，也具備一些傳統中華風格。由前所述，對

⁹⁶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 52-53。

⁹⁷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 52-53。

⁹⁸ 沈錡形容這位外長精力過人，晚上嫖完早上又嫖，然後才去拜會嚴家淦。參考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五冊，頁 610；在臺北行賄非洲訪客，則可參考同書 86 頁。外交需要賄賂不難理解，除了臺北外交部解密檔案中偶可查知，沈錡也在回憶錄中提及臺北外交部指示非洲駐館行賄、楊西崑行賄、及美國駐非官員鼓勵臺灣行賄等等。參考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三冊，頁 206、301、354。在非洲這可能也是公開的秘密。肯亞當地的報紙 Daily Nation 於 1961 年 7 月 6 日質疑楊西崑見政治領袖 Jaramogi Oginga Odinga (後任該國副總統)時曾贈予金錢，Odinga 只承認楊西崑贈送一條圍巾與受邀訪臺灣。贈機票遊臺灣在臺北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中也時常可見，不過內容比較清楚的是北京外交部所藏楊西崑 1963 年 12 月 27 日致尚吉巴總理 Sheikh Mohammed Shamte 的私函。該國當時雖已承認北京，楊仍試圖挽回，該信即為文中「愉快與豐富的旅程」的出處：「I wish to reiterate my invitation to you to come to visit my country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You are kindly requested to have with your two or three of your colleagues from your government. While in my country, you and your party will be guests of my government. First-class round-trip air-passage ticket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you as soon as you can fix the date of your departure and the membership of your party and inform us thereof. And I can assur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to make your trip to Taiwan a joyous and fruitful one.」全信未提農業援助。以上楊西崑在肯亞與尚吉巴的紀錄，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藏，〈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桑給巴爾大使館電部〉(1964 年 2 月 15 日)，「臺灣副外長楊西崑致信給桑給巴爾總理謝赫對桑決定同我建交表示關切並邀請其訪臺，1963 年 12 月 27 日」，檔號：108-00440-04；〈蔣幫份子楊西崑在東非活動情況〉(1961 年 8 月 2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代辦處發)，「臺灣當局在東非的活動狀況，1961 年 2 月 18 日至 1961 年 8 月 15 日」，檔號：108-00228-01。

一些華人而言，由於非洲所象徵的落後性，黑人與華人女子的性行為會產生類似「惡種」與「美種」交配後受到污染的惡感，沈錡就指圓山飯店則對非洲客人嫖妓有歧視，不斷進行騷擾影響其情緒，但是階級較高的「美國人住圓山玩女人，他們屁都不敢放一個」。⁹⁹

五、反抗美國

（一）美國與臺非關係

臺灣對美國人較為敬畏的理由，除了歷史因素外，美國不但是當時臺北國際關係的主要支持者，也是臺非關係的幕後金主，受到尊敬自有其本。不過既然中華民國自認在非洲也是大國，受到的尊敬可與美國相比，為了擔心大國尊嚴受損，美國提供經費的事實必須高度保密，這個事實直到1967年才由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彭岱（William Bundy, 1917-2000）在國會中公開。彭岱的邏輯是美國人出資請相對廉價的臺灣人去援助非洲較實惠，但「神氣的中國人」成了美國雇用的廉價勞工，大國形象受損，嚴家淦因此對華府抱怨此舉讓臺灣在國內及非洲丟臉。¹⁰⁰

除了資金，美國也提供其它影響力幫助臺灣外交。華府請英國不要阻擋即將獨立的殖民地波札那、賴索托、與史瓦濟蘭等與臺北建立外交關係。¹⁰¹ 模里西斯獨立時即承認中共，對臺灣的農技沒有興趣，但有財務問題，與中共正式建交會拖至1972年，明顯的基於美國的壓力。¹⁰² 雖然在衣索比亞也是先鋒案受援國之一，但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Haile Selassie）告訴周恩來，是美國的援助讓他不敢轉向北京。¹⁰³

⁹⁹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五冊，頁205。

¹⁰⁰ 劉曉鵬，〈從非洲維持美臺聯盟：重新檢視「先鋒案」〉，頁173。

¹⁰¹ Telegram, "State Department to both American embassies in London and Taipei, March 16, 1966, in China Cables",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China) Box 239, Vol. 6,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¹⁰² 臺北外交部檔案中，有兩卷模里西斯檔案對此關係有描述。參考中華民國外交部藏，「爭取模里西斯，五十六年五月至五十七年四月，第一冊」、「爭取模里西斯，五十七年四月至八月，第二冊」，《非洲司檔》，檔號：211.1。正常檔號在211.1處會有更細緻的案次號，此檔並未標明。

¹⁰³ 陳敦德，《探路之行：周恩來飛往非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269。

然而，美國的壓力也不是絕對。由於非洲獨立國家反帝反殖傾向濃厚，也因北約盟國的關係、膚色理由，與美國當時黑人爭民權運動的背景，美國經常是反殖反帝的對象，故許多非洲國家也不願被歸類為親美，加上美國駐非洲國家的大使也不一定了解中國政策的微妙性，美國施壓有時會有反效果。楊西崑解釋美—臺—非的敏感關係：

非洲國家對美常存反感……若干美駐使對我不友好或不受歡迎，爾等代我洽助，必將產生不利之影響……但從世局而言，美政府在聯大繼續助我之態度有決定性關聯……除少數特殊情況外，我對非仍以我駐館單獨洽助為妥。¹⁰⁴

臺灣在內部洽助，美國在外圍暗中助勢，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在非洲拉票的基本結構，也等於是臺灣在美國暗助下在非洲扮演大國。在此結構下若美臺力量相同當然是事半功倍，而且由於對非農技援助是美國財政支援的結果，這個結構順利運轉也證明美國政策成功。但若臺灣的力道與美國方向相反，非洲國家抵制美國，那就變成美國金援臺灣來反對自己了。因此，臺非關係最大的反諷，就是臺灣動員非洲的力量反抗美國。

（二）研究委員會案

1961年甘迺迪政府上台，美國支持二個中國聲浪很高。如前所述，中華民國面臨遷臺以來最大的國際壓力。就維持聯合國代表權與非洲的關係而言，目前的學術研究主要偏向於計算「中國代表權」的投票情形，證實非洲的支持。也有研究將「重要問題」納入統計，指出臺北毫不遜色於北京的支持，進一步驗證先鋒案的成功。¹⁰⁵然而，在這兩個議題的投票中，臺灣與美國都是一致，因此也難以顯示臺灣的影響力。惟有臺北和美國立場不一致的情況，才能看出臺灣在非洲的真正實力。

¹⁰⁴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楊西崑自迦納電部〉（1970年8月24日），「第廿五屆大代表權案第三冊，五八年八月至五九年十二月」，《非洲司檔》，檔號：A4/0001。

¹⁰⁵ 張紹鐸、胡禮忠，〈「臺灣當局」對非洲農技「外交」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60-1971年）〉，頁32-37。

先鋒案在 1961 年出現，雖然其主要目的在保衛其聯合國席位，惟來自非洲的支持也間接發展出拒絕兩個中國的功能。王文隆即指出，先鋒案能視為臺北亟思突破國際兩個中國氣氛的手段，為自己在聯合國爭取票源，而「有趣的是……所需的經費，卻仍需向心底實質想推動『兩個中國』的甘迺迪政府爭取。」¹⁰⁶

非洲票增加後，1962 年楊西崑亦指出「我國對非外交已開始有了成效，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使國內外同胞中失敗主義者覺醒。當美國民主黨執政之初，史帝文生與已故羅斯福夫人一度高唱兩個中國的論調，去年〔按：1961 年〕四月英國首相麥米倫訪美，又給悲觀人士一項中國將被出賣的杞憂……所幸我外交政策堅定的立場……也讓我們在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中，打了一次勝仗……非洲國家投票支持我國的有十七國。」¹⁰⁷ 有了非洲國家的支持，臺灣的確更能堅持一個中國。

最能展現壓制美國兩個中國的力量，就屬 1966-1968 年的「研究委員會案」投票情形。1960 年代中期，聯大兩個中國氣氛濃厚，1966-1968 年的義大利與加拿大等國為解決中國代表權爭議，也協助臺灣保有國際地位，提出「研究委員會案」，試圖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做研究」。「研究」本身即認為臺灣不該在聯合國代表中國，而「研究」的結果可預期當然是「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

這個策略獲得許多北約盟國的支持。由於擔心兩個中國的結果，臺灣固守原有立場奮力打壓。臺灣的友邦連提三年，結果臺灣和北京聯手打壓三年。臺大政治系教授高朗評道：「雖然滿足國內一個中國的心理，卻沮喪友邦和中立國家替我們開的一條路。這段歷史，讀之另人感嘆。」¹⁰⁸

一般的概念上，臺灣外交是依據美國指揮行事。美國在此案顧及臺北顏面，沒有公開拉票，但十分支持北約，在 1966-1968 年間都投票贊成，認為聯合國應「研究」，且該案連早已承認北京的英國都連續三年以棄權表示不反對。臺灣面對此案時一方面激烈反抗，以退出聯合國威脅美國，另一方面也動員友邦反對。1966-1968 年三次投票勝負差距都不小。1966-1967 年贊成與反對票差距分別是

¹⁰⁶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 62。

¹⁰⁷ 《外交部週報》610（1962 年 12 月 27 日），頁 2。

¹⁰⁸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〇～一九七二）》（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220。

28 與 25，1968 年提案國明白「雙方不領情必然失敗」，¹⁰⁹ 拉票能力減弱，差距再擴增到 37，此後再也沒有提出。

表一 研究委員會案投票情形（1966-1968）¹¹⁰

票數分類 年份	支持該案	反對該案	棄權	支持該案的臺北／北京承認國	反對該案的臺北／北京承認國	棄權的臺北／北京承認國	支持該案的臺北／北京非洲承認國	反對該案的臺北／北京非洲承認國	棄權該案的臺北／北京非洲承認國
1966	34	62	25	24/7	19/41	19/4	4/2*	12/15**	4/1
1967	32	57	30	22/8	19/36	21/6	3/2*	11/10**	6/6***
1968	30	67	27	21/7	24/41	19/5	1/2*	13/15**	7/3***

說明：* 1966-1967 年的支持者皆為北非阿拉伯國家：摩洛哥與突尼西亞，1968 則摩洛哥轉為棄權，突尼西亞持續支持。

** 需考慮兩個北非阿拉伯國家：阿爾及利亞與埃及，他們不屬「黑」非洲。

*** 1967 年棄權者包括 2 個未出席國家：尚比亞與索馬利亞，索馬利亞 1968 年仍未出席。

早在 1966 年此案投票前，當美國告知臺北，加拿大和義大利不贊成原有戰術而欲推動該案時，外交部長魏道明的反應是「加拿大非強國（not a major power）……義大利在關鍵的非洲地區也沒有影響力（without influence in key area which is Africa）」。¹¹¹ 臺灣迎戰來自歐美的壓力，而且主要的支持就來自非洲。

（三）非洲的「重要性」

北京對研究委員會案自然採反對立場，其大多數承認國也與其態度相同，棄權與支持該案者都偏低。就其非洲盟友而言，大多也依意願投票，佔其所領導反對國數約三分之一，且棄權與支持者也偏低。但即使力量集中，若不考慮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完全忠於北京立場的「黑」非洲友邦在數量上大約在 8-13 個之間。

¹⁰⁹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〇～一九七二）》，頁 217。

¹¹⁰ 本表製作依中華民國外交部藏，〈聯合國歷屆大會對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投票紀錄〉（1971 年 2 月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案第一冊，六十年三月至八月」，《北美司檔》，檔號：414/28。因邦交隨時變動，有些承認北京國家未與其建交，而承認臺北的多已建交，於此統稱「承認國」。

¹¹¹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XXX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Document # 163. 下載日期：2011 年 6 月 8 日，網址：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_XXX/160_169.html。

支持與棄權該案的主力都是臺北邦交國。臺灣在本案中雖持反對立場，邦交國意向大約是三分之一支持，三分之一反對，三分之一棄權。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友邦的壓力十分平均：一方面為了臺灣的政治前途，應該與歐美一致，支持「研究」兩個中國的可能，但是臺灣又動員盟國反對。我們可以大致假定，臺灣邦交國中投反對票表示臺灣的遊說發揮作用。有些國家則為避免得罪雙方，選擇棄權不表態。擊敗這個案子大部分的功勞屬北京，但外交部次長沈錡在 1966 年投票之後，在行政院會報告時仍稱「我們單獨作戰，得到這個結果……雖不理想，但也盡最大力了」。¹¹²

在這個和美國唱反調的「單獨作戰」中，臺北盡的力主要在拉低支持者和增加反對者。非洲友邦明顯地較易受臺灣影響。臺灣動員反對該案的力量，至少一半以上都是靠非洲國家支持，也有超過百分之六十者。由這個數字我們可以發現，在總計約 20 個臺灣的非洲友邦中，至少在臺灣國際地位問題上，完全受歐美國家影響的（支持國）數字不斷萎縮。臺灣可與歐美國家影響力相仿的約在 4-7 個（棄權國），臺灣大於歐美國家影響的「黑」非洲國家大約是 11-13 個（反對國）。從這個數字看出臺灣在非洲的確建立了影響力，足以與北京抗衡，也解釋其 1960 年代擔任非洲領袖的強大的自信。

但是官方也明白，臺北擁有非洲支持，也基於非洲幼稚與善變等落後的象徵。沈錡同次會議中特別強調非洲在此次投票中的角色，也解釋非洲為何如此重要：

非洲國家對我關係重大，此為一明證。許多有歷史的國家，成熟的國家，一下子不易改變立場，如英印等。而新興國沒有那許多顧慮，或因內政因素，一夜間改變態度，所以我們今後對非洲方面的工作值得特別重視。¹¹³

換句話說，非洲國家由於其「不夠成熟」且容易「一夜間改變態度」，容易被臺北以各種手段拉攏，所以「值得特別重視」。

¹¹²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五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外交部次長沈錡行政院會議發言〉（1966 年 12 月 1 日），「代表權案一般資料，六十年十一月」，《國際組織司檔》，檔號：90043/640。

¹¹³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五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外交部次長沈錡行政院會議發言〉（1966 年 12 月 1 日），「代表權案一般資料，六十年十一月」，《國際組織司檔》，檔號：90043/640。

美方金援是臺灣拉攏非洲的基礎。美國支持的農業援助，加上非洲國家的「不夠成熟」，臺灣 1960 年代在非洲不但成功將自己鞏固成另一個中國，還在非洲建立了反抗歐美的能力，理論與現實上都被用來做為堅持一個中國的力量。在冷戰的格局中，臺灣的非洲友邦大多走親西方路線，先鋒案則將這層關係調整為己用。歷史不能輕易假設，若說這些非洲國家若無先鋒案就一定會倒向西方而實現兩個中國，失之武斷。但先鋒案所建立的實力確實協助「滿足國內一個中國的心理」，特別是在 1960 年代中，挫折了歐美盟邦協助臺灣認清現實的努力。

六、結論

1970 年底國際氣氛已明顯改變，「研究委員會案」中替臺灣開路的加拿大和義大利相繼轉而承認北京，形勢不利下非洲國家仍可安慰臺灣。臺北外交部一方面引用駐非官員的話，強調非洲國家仍十分感謝農業援助，這兩國轉向對非洲無影響。¹¹⁴ 另一方面在失去這兩個重要友邦的沮喪時刻，剛好也有兩位非洲總統——中非的卜卡薩（Jean-Bédél Bokassa）與剛果的莫布杜伉儷——分別來訪，未攜眷的前者在此行選走一位高雄佳麗「阿春」。¹¹⁵

非洲不僅有安慰功能，也有警示功能。1970 至 1971 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投票之間，大批與北京建交的國家約有一半來自非洲。¹¹⁶ 其中喀麥隆與獅子山原是臺北邦交國與先鋒案受援國。衣索比亞與臺灣無邦交但也是先鋒案受援國，他與其它二個非洲國家（奈及利亞、蒲隆地）早已承認北京，決定正式與北京交往。局勢很清楚，臺灣連「落後的」非洲都很難再拓展，非洲也並不那麼感謝農業援助。

¹¹⁴ 《外交部週報》1021（1970 年 11 月 17 日），頁 7。

¹¹⁵ 「阿春」一詞為當時中非總統農莊臺灣農耕隊員對她的暱稱。卜卡薩後來稱帝，「阿春」的事蹟曾在 1996 年皇帝駕崩前引起討論。有關她的媒體報導很多，在此僅舉管仁健先生部落格〈為國捐「軀」的中非總統九姨太〉當參考，下載日期：2011 年 6 月 8 日，網址：<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20775304>。

¹¹⁶ 這些與北京建交的國家是：奧地利、智利、科威特、土耳其、伊朗、衣索比亞、奈及利亞、獅子山、與喀麥隆。蒲隆地在 1965 年與北京中止邦交，雖一度盛傳將與臺灣建交並接受援助，惟仍於 1971 年中國代表權投票前兩週與北京恢復邦交。此外，赤道幾內亞與北京建交時間與加拿大相近，都在 1970 年投票前不久，而比利時則在 1971 年投票日與北京建交。

臺北終於認清現實，一個中國的堅持成了兩個中國的妥協——也就是 1971 年臺北在聯合國所爭取的「一中兩席」與「雙重代表權」。從堅持一個中國到接受二個中國，非洲友邦政策配合上多半沒有調適障礙，仍是臺灣在聯合國支持的主力。惟少數也發揮「一夜間改變態度」的特色，使得毛澤東能得意地宣稱北京進入聯合國「是非洲黑人兄弟抬進去的」。¹¹⁷

臺灣的非洲友邦在情勢變遷後不久也紛棄臺北而去。其中薩伊（莫布杜在 1971 年將國名由剛果改成薩伊）在 1972 年轉向讓臺北十分難堪，故斷交後也一吐交往時的積怨，如丁懋時指「薩人性格衝動」、楊西崑指責莫布杜「缺乏才識」等等。一個社論評道：

薩伊承認中共，我們在驚異之餘，還有某種程度被人矇蔽之感。一向在國內的報紙上，有關薩伊的新聞不僅特別多，而且千篇一律強調中薩感情如何敦睦……我們怎樣花錢替薩國總統開闢一處廣大的農場……這是一個教訓，它告訴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再空口說白話的誇張。¹¹⁸

臺薩關係是臺非關係的一個縮影。1960 年代臺非關係起於防止北京進入聯合國，終於北京進入聯合國，或許確實如許多官學界人士所言，農技援非成功拖延北京入聯。然而從臺北 1971 年接受兩個中國的結局來看，正因為非洲容易製造關係敦睦的劇情，結果這張「王牌」幫助臺北建立的不止是聯合國的票數，還包括代表中國的信念、固守一個中國政策，與打擊不同意見友邦的力量。臺北在 1960 年代初就該認清現實，在聯合國面對北京入會的挑戰，拖延了十年又被迫認清同樣的現實。這十年間臺北勉強討好打心裏瞧不起的新興非洲國家，也因「落後」、量多、易買通而迷信其支持，對自己的身分與實力產生錯覺，進而延緩對現實的認識。

¹¹⁷ 北京由非洲黑人兄弟抬進聯合國的形容，散見於許多與聯合國相關的學術著作，例如張樹德，《中國重返聯合國紀實》（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393。即使由「外交教父」錢其琛擔任顧問而撰寫的作品亦如此，參考王泰平主編，《新中國外交 50 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下卷，頁 1715。英文作品可參考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2.

¹¹⁸ 以上與薩伊斷交的資訊，參考中華民國外交部藏，〈楊西崑電部〉（1972 年 11 月 27 日）、〈丁懋時電部〉（1972 年 11 月 28 日）、與〈社論：來自薩伊與澳洲的壞消息〉（剪報日期不詳，應為 1973 年 2 月初），「中薩斷交，六十一年四月廿九日至六十二年六月廿六日」，《非洲司檔》，檔號：87001/212.1。

當時主導先鋒案的「非洲先生」楊西崑事蹟今天已被列入「漢聲中國童話」，其有聲書在網路上分布廣遠。先鋒案的成功事蹟是在非洲蠻荒、擊鼓，與嘶吼的背景中傳達出來，聽者很容易辨認出文明差距，援助所產生的階級一覽無疑。故事中形容農耕隊在惡劣的環境中辛苦種稻，而非洲人嚐到白米飯後，就把臺灣人當作「魔術師」或「神明」，楊西崑也被稱許為與張騫、班超同等身分的外交家。這不僅是童話，也是 1960 年代臺非關係的主要論述。臺灣享受到非洲「神明」般的崇拜，行為和信念都模仿大國，忘了另一個身分只是美國聘請到非洲的廉價勞工。

引用書目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68, vol. XXX.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China),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北美司檔》，檔號：414/28。臺北：中華民國外交部藏。

《非洲司檔》，檔號：211.1、231.32/0002、583/非 24、87001/212.1、A4/0001、AI/14、CM/19。臺北：中華民國外交部藏。

《國際組織司檔》，檔號：90043/640、90043/640。臺北：中華民國外交部藏。

《外交部週報》

《聯合報》

「臺灣副外長楊西昆致信給桑給巴爾總理謝赫對桑決定同我建交表示關切並邀請其訪臺，1963年12月27日」，檔號：108-00440-04。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藏。

「臺灣當局在東非的活動狀況，1961年2月18日至1961年8月15日」，檔號：108-00228-01。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藏。

王文隆

2004 《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王泰平（主編）

1999 《新中國外交 50 年》，下卷。北京：北京出版社。

外交部非洲司、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

1976 《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臺北：外交部。

任薇孫（編）

1970 《非洲與中國》。臺中：自刊本。

沈 錡

2000 《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沈劍虹

1982 《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宋勝祥

2002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駐甘比亞技術團工作經驗談〉，收於高小玲、邱裕瑄，《駐塞內加爾、甘比亞技術團業務暨督評估暨塞內加爾中小企業技術協助計畫期中評估，民國 91 年 2 月 24 至 3 月 12 日》，附件 3 之 2，頁 7。臺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施民男

2003 〈非洲生活憶往〉，《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電子報》44，下載日期：2011 年 6 月 15 日，網址：http://www.icdf.org.tw/epaper_file/20030929134921v2epaper-no44.html#3。

耿修業

1968 《非洲見聞錄》。臺北：大華晚報社。

徐萬椿

1966 《非洲訪問記》。臺北：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

高朗

1993 《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〇～一九七二）》。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紹鐸、胡禮忠

2009 〈「臺灣當局」對非洲農技「外交」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60-1971年）〉，《西亞非洲》3: 32-37。

張樹德

1999 《中國重返聯合國紀實》。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郭敏學

1969 《非洲七十日》。臺北：臺灣日報出版社。

商岳衡

1970 《非洲新面貌》。臺北：新聞天地出版社。

陳敦德

1999 《探路之行：周恩來飛往非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康有為（著）、鄭柏林（選注）

1994 《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鄭文聚

2000 〈從援助到合作開發：展望廿一世紀的中非農業合作〉，收於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編，《中國與非洲》，頁 302-3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曉鵬

2007 〈從非洲維持美臺聯盟：重新檢視「先鋒案」〉，《臺灣史研究》14(2): 161-181。

蔣碩平

1983 《非洲十五年與旅途見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lifford, William

1968 "These Are the Saints." *The Rotarian* 113(5): 24-26.

Deng, Yong

2008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kotter, Frank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udge, Paulette

2003 *The Whiteness of Power: Racism in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nd Ai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utchison, Alan

1976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Hevi, Emmanuel John

1966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Johnson, M. Dujon

2007 *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 Chines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s and African-Americans*.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Krenn, Michael L. (ed.)

1999 *The Impact of Race on U.S.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New York: Garland Pub..

Liu, Philip Hsiaopong

2009 "Planting Rice on the Roof of the UN Building: Analysing Taiwan's 'Chinese' Techniques in Africa,
1961-pres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98: 381-400.

Rowe, David Nelson

1963 *Free Afro-Asi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New York:
American Afro-Asian Educational Exchange.

1969 *The New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echnical Projec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frican Countri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National Council of Scholars.

Snow, Philip

1988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Sautman, Barry

1994 "Anti-Black Racism in Post-Mao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413-437.

Sullivan, Michael J.

1994 "The 1988-89 Nanjing Anti-African Protests: Racial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Ra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438-457.

Wei, Liang-Tsai 魏良才

1982 *Peking versus Taipei in Africa, 1960-1978*.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White, George

2005 *Holding the Line: Race, Rac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1953-196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eyond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Little China's Big African Illusion

Philip Hsiaopong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Africa during the 1960s from a raci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rough a Taiwanese vers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 Taipei rationalized the political support it received from Africa in the UN. In this framework, Taiwan’s Chinese cultural superiority over “backward” black Africans made it only natural for Africa to recognize Taipei’s leadership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refore, while Taipei’s claims to Chinese legitimacy declined,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 Taipei could still have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self as a great nation and the legitimate China.

Keywords: Africa, Racism, Black People, Assistance, Vanguard Project, Hsi-kun Yang

